

1938年6月,在苦难中煎熬了几个月的南京城,渐渐平静了下来。在鼓楼医院工作的外科医生威尔逊,也告别了紧张的让人吃不消的工作节奏离开了南京。

时间退回到半年以前。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日军侵占,南京鼓楼医院因为具有教会医院的背景和特殊的地理位置,被划入国际安全区内,也因此成为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城内唯一对平民开放的医院,以威尔逊医生为代表的留守医护人员不顾个人安危,克服重重困难,救治了大量伤病员。他们用行动践行着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芒。与此同时,也见证记录了日军暴行并与之进行了坚决反抗。

时间再推进到75年后的今天,南京鼓楼医院建院120周年,那些为南京和平作过贡献的先辈们在我们的记忆中并未走远……

□柳辉艳 王斯瑶



1892年建院时的病房楼,现为医院历史纪念馆  
本版图片由鼓楼医院提供

# 东京审判 威尔逊第一个出庭作证

南京鼓楼医院是南京大屠杀期间城内唯一对平民开放的医院,威尔逊时任外科医生

## 20多位中外医护人员 英勇留在南京

南京鼓楼医院,又名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它的前身是1892年由美国教会资助的、加拿大籍传教士威廉·爱德华·麦克林医学博士创办的“基督医院”,这是南京第一所西医院,也是中国最早的西医院之一。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展开全面侵华战争,并于1937年8月15日开始对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展开疯狂轰炸,鼓楼医院从那时起就开始收治因日军轰炸而造成的伤员。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发表后,中央党政机构和老百姓纷纷撤离南京。但鼓楼医院仍有部分医护人员英勇地留下来继续履行他们的职责,包括两位美国医生,一位中国医

生,两位外国护士及几位中国护理人员,共约20人。

留守的鼓楼医院成为当时整个南京城内唯一一家对平民开放的医院,也是当时南京安全区内唯一的医疗救助机构。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撰写的《拉贝日记》中,记载着1937年12月8日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一周工作回顾》:“大学医院(鼓楼医院)位于区内,负责承担病人的治疗和护理工作。目前该医院只拥有数量很少的医生,为此请求所有目前还在城里的医生,自愿为鼓楼医院提供服务。”1937年12月9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供中国报界专稿”中又记载:“伤员可以送到鼓楼医院,要救护车请拨打电话31624。”

## 让拉贝无法忘记的 海因兹和鲍恩典女士

鼓楼医院当时留守的外籍人员主要包括威尔逊医生、特里默医生、鲍恩典化验师兼护士和海因兹护士,以及南京大屠杀期间负责医院管理的麦卡伦牧师。

威尔逊1929年获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36年来鼓楼医院工作。南京大屠杀期间,很多患者都受到刀伤或枪伤,威尔逊作为当时医院唯一的外科医生,工作量可想而知。他在1937年12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150例病人中只有10例属于内科和产科,其余都是外科。昨天我做了11例手术。”日军占领期间,威尔逊医生坚持在医院工作,直到1938年4月,无锡圣安德烈医院的李医生和另外一位医生及两位护士来到鼓楼医院,6月初他才得以离开南京。

特里默大夫是内科医生,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兼管医院产科和X光科,同时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鲍恩典女士1919年10月来南京,就职于鼓楼医院,任医院检验室主任和医学院检验室讲师;海因兹女士1924年开始在鼓楼医院从事护理工作,1937年她已六十多岁,但她在那样的非常时期还是选择了留在医院,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麦卡伦牧师1921年来华,一直在南京任传教士,南京大屠杀期间,他作为鼓楼医院

和难民救济的管理人员留在南京,主要负责运输医院粮食、接送患者,并主管医院宗教科。

“我一定会始终回忆起海因兹小姐和鲍恩典小姐在我们唯一的医院里(鼓楼医院)做的艰苦而踏实的工作。鼓楼医院由于人员减少,只有特里默大夫和威尔逊大夫两名外国医生以及医院院长麦卡勒姆(麦卡伦)先生,还有前面提到的少数女士,他们在医院工作中做出了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的成绩。因为它只有少量的人员(中国的和美国的),他们在完全超负荷地工作,已是精疲力竭。”拉贝先生在他离宁前的答谢辞中这样评价道。

因为伤员众多,仅靠留守医务人员根本无法照顾,大屠杀期间医院大量招募医生和护士。随着南京保卫战失败,部分军医未能及时撤离,也加入鼓楼医院,如原南京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卫生队的周纪穆医生、原南京战地医院祁明镜院长、徐先青和祁刚医生等,这部分人到医院大多担任内科医生。根据麦卡伦牧师致家人函记载,1937年12月29日,鼓楼医院全部在岗职工约有100人。

## 70%的病人 免费就医

在当时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马吉牧师拍摄的《南京暴行纪实》(这是留存至今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影片中,有很多当时伤员到鼓楼医院救治的画面,拉贝先生也在日记中提及,影片中提到的好多伤员他都看见过,“有几个人在死前我还和他们说过话,其中有些人的尸体,鼓楼医院还让我在停尸房看过。”

记录下来的部分患者因为他们的创伤实属罕见而令记者震惊,如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当时她有6个月身孕,与3个日本兵搏斗,身中33刀,后被送往鼓楼医院救治,虽然胎儿流产,但李秀英却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

除了救治受伤的普通老百姓,鼓楼医院当时还冒险救治了很多伤员,据周纪穆医生回忆:有一个教导总队的连长,右下肢受伤,到鼓楼医院治疗,威尔逊医生为他取出子弹,后被日军拖走,再没回来。在《南京暴行纪实》中,马吉牧师也拍摄到了当时鼓楼医院救治当过兵的患者的镜头。

不过,由于当时环境险恶,人身安全无法保障,而且医院每个人都在超负荷工作,因此医院的救治记录并不全,因此,鼓楼医院在大屠杀期间到底救治了多少患者,至今也无法准确统计。

在大屠杀后期,为预防各种疫病,国际委员会联合鼓楼医院在难民区内展开预防工作,除了常规门诊及紧急增添的160张病床外,医院在红十字会的协助下又开设了3个户外诊所。医院职工还发起一场预防运动,给16265名市民注射天花疫苗,还给12000多名市民接种伤寒、霍乱疫苗。但是医院的经费问题却十分突出,当时只有3%的病人有能力支付一、二类医疗费用,只有30%的病人有能力支付第三类医疗费用,对另外无支付能力的70%病人必须实行免费就医。

由于医疗任务十分繁重,而食品供给又严重短缺,再加上经常受到日军的侵扰,导致医院员工的生存质量很差,威尔逊医生和特里默医生在此期间一度累病。



一名受伤的男孩在鼓楼医院就诊

## 日军闯入医院向外籍医生开枪

虽处安全区内,鼓楼医院及工作人员也时常遭到日军的骚扰,根据拉贝日记中关于“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的记载——1937年12月14日,日本士兵搜查了鼓楼医院和女护士的寝室,进行了抢劫,当天,日本士兵还闯进鲍恩典女士家中,喝光桌上牛奶。12月16日,日本士兵企图偷走鼓楼医院的救护车,被马吉牧师及时制止。12月18日,3名日本士兵从医院后门闯入,海因兹小姐遇到了这些闯入者,他们抢走了她的手表。威尔逊医生赶走企图强奸护士的日本兵时,日本兵掏出枪对准威尔逊,似乎要对威尔逊开枪。12月19日,一日本士兵闯入鼓楼医院,当麦卡伦

先生和特里默大夫要求他离开医院时,他竟然朝他们开枪,幸亏子弹打偏了。1938年1月16日,麦卡伦牧师要求从后门进来的两名日本兵离开医院,结果颈部被日本兵用刺刀刺伤……

面对日军的侵扰,麦卡伦、威尔逊、特里默、鲍恩典、海因兹等利用其特殊身份,冒着生命危险与日军交涉。1937年12月19日,威尔逊写信给日本大使馆,抗议日本兵对医院的抢劫、强奸犯罪,并要求日本大使馆给予医院特殊保护,设立宪兵哨岗。在现状未得到改变的情况下,12月21日,麦卡伦、鲍恩典等人纷纷到日本大使馆去“请愿”,要求恢复正常的法制和社会秩序。



威尔逊医生在东京审判中出庭作证的照片

## 威尔逊避开日军审查 通过美国记者送出日记

当时,医护人员还纷纷以书信、日记、报告的形式,将他们所看到的中国难民遭受日军暴行的事件记录下来,通过“南京安全区委员会”向日本大使馆进行抗议,这些记录后来都成为控诉日军罪行的有力证据。此外,还试图向外界提供南京城内的真实情况。1937年12月15日,当威尔逊医生知道英、美记者斯蒂尔、史密斯将前往上海时,他赶紧上楼,将一些日记塞进信封,让他们带走。威尔逊医生还在1938年1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终于有机会能避开日本人的审查送出一些邮件。”1946年,威尔逊医生远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担任过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秘书的高文彬教授回忆,威尔逊医生是第一个出庭作证的,他在

东京审判书面证词中写道:“日军入城后不久,送往鼓楼医院救治的平民人数急剧上升,日军针对城中平民的暴行在持续六周后才开始减退。我保证以上所述完全属实。1946年6月22日。”

目前,威尔逊日记原件存于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1992年南京鼓楼医院建院100周年时,一位名叫加登英成的日本人向医院赠送了这份日记的复印件和录像带。鲍恩典日记原件目前保存在鼓楼医院历史纪念馆,是由其在美国的侄子瑞恩2007年交给医院保管的。2008年,鼓楼医院还收到了周纪穆医生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风雨九十载》手稿,当中就记录着日军侵占南京的那段历史。(本文参考《拉贝日记》《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风雨九十载》)